

社会结构变迁与日常生活叙事：铁凝小说的书写分析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Daily Narration: A Writing Analysis of Tie Ning's Novels

江立华（Jiang Lihua） 周泓宇（Zhou Hongyu）

内容摘要：本文以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审视铁凝小说的日常生活书写实践，揭示其文学创作如何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城乡与人性的三大命题。在性别叙事层面，铁凝以独特的“第三性视角”突破传统性别与城乡二元对立的话语立场，以冷峻而共情的笔触呈现其作品中女性角色的生命历程，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女性身体叙事、道德困境与主体性觉醒的复杂特征。在乡土叙事层面，铁凝以“乡土主体性”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既揭露城市化对乡土伦理的冲击，也挖掘乡土社会在现代化夹缝中的韧性。在人性叙事层面，铁凝的作品将目光锁定于人性的幽微之光，通过充满血肉矛盾体的人物塑造，在历史裂变中探寻人性尊严与精神家园的永恒价值。她的小说不仅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者，更是一场关于“人何以为人”的精神远征。在历史洪流与个体命运的共振中，铁凝以文学的名义，完成了对社会变迁的史诗性书写与人性本质的哲学性追问。

关键词：铁凝；第三性；社会变迁；日常生活；女性书写

作者简介：江立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与城乡社会学；周泓宇，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与城乡社会学。

Title: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Daily Narration: A Writing Analysis of Tie Ning's Novels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o examine Tie Ning's 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quotidian existence, revealing how her literary creation responds to three major proposition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gender, rural-urban dynamics, and human nature. In terms of gender narrative, Tie Ning transcends conventional gender and urban-rural dichotomies through a distinctive "third-gender perspective," presenting the life course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her works with cold and empathetic strokes. These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illuminate the complex interplay of female body narratives, moral dilemmas, and awakening of subjectivity during periods of social

model transition. Regarding the city-country narrative, Tie Ning reconstructs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conceptual lens of “rural subjectivity.” Her works not only reveal the erosion of rural ethics by urban encroachment but also explore the cultural resilience of rural societies in the interstices of modernization. At the level of humanistic exploration, Tie Ning’s works focus on the subtle glory of human nature, and through three-dimensional and complex characterization, she explores the dignity of human beings in the fissure of history and the eternal value of the spiritual home. Her novels serve not merely as faithful chronicles of the era, but a spiritual expedition about “what makes a man a man.” Through the resonance between historical torrents and individual destinies, Tie Ning’s literary creations achieve dual significance: they present both an epic portrayal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ity.

Keywords: Tie Ning; third-gender perspective; social change; daily life; female writing

Authors: **Jiang Lihua**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ocial theory and urban-rural sociology (Email: jiang651@263.net). **Zhou Hongyu**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ocial theory and urban-rural sociology (Email: letheva@mails.ccnu.edu.cn).

在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如何以文学之笔镌刻大众生活的肌理、摹写世道人心的图谱，如何书写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故事，这是当代文学创作者面临的时代命题。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书写者，铁凝以其温润而锐利的文学笔触，在40年创作生涯中持续探索着生存本相与人性幽微，其作品既葆有对生命个体的深切悲悯，又彰显着对社会变革的敏锐洞察。当前学界对铁凝创作的研究多聚焦于她的矛盾命题，对其不同创作阶段作品进行吉光片羽式截取，进行女性主义分析、文学批判分析，而缺乏将其创作历程、作品置于社会层面进行分析，这种以共时性为主的批评范式虽具局部阐释效力，却难以完整呈现她的创作理念与时代精神的深层共振。文学不仅是纸墨间的精雕细琢，更是映照社会历史的一面明镜。当我们对铁凝的文学实践置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坐标系中进行历时性地梳理和考察，会发现她没有被政治与意识形态所困，而是始终将角色的命题与社会、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站在第三性视角思考人生与生命，追求精神上的真正平等，追求和谐的人类理想。

一、社会结构变迁与女性角色塑造

（一）从具体的女性到历史的女性

女性、爱情与婚姻问题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在铁凝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她对女性身份、女性命运和女性觉醒的书写总是透露着时代心声和人格魅力，她笔下的性别图景始终与现代化进程保持对话关系。

“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文化结构是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传统文学中的女性角色以柔顺、牺牲、温柔为特征。新中国的成立，随着《婚姻法》的颁布与“妇女能顶半边天”意识形态的推行，性别平等从观念启蒙转向制度实践。女性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参与到社会建设和政治生活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铁凝早期创作中的“香雪们”以未被规训的生命野性冲破文化禁锢。初作《会飞的镰刀》里挥舞农具的少女们，不仅是劳动美学的诗意呈现，更是对“妇功”礼教的文化反叛；《哦，香雪》中穿越铁轨追寻铅笔盒的执拗身影，不仅闪烁着“一双善良、纯朴、充满美好的向往，而又无限活泼生动的眼睛”（王蒙 654），而且隐喻着乡村女性突破地理与精神边界的现代性觉醒。

当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传统伦理体系，中国传统的女性社会地位和性别意识开始受到不同力量的冲击并开始重塑，女性作家们开始摸索个体化写作和历史性写作的意义。在这个时期，铁凝的女性书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叙事张力，她将自己对社会的生活体验融入到自己所创作的角色和故事之中。农村女性的善良和清新充溢着铁凝的目光，成就了她的角色塑造。如果说1982年发表的《哦，香雪》饱含着对于农村女性的天真淳朴的反掘，1989年发表的《玫瑰门》则完成了从倾诉女性到拷问女性的转变。后者通过司猗纹“变形记”般的生命轨迹，揭示出性别压迫的隐蔽机制：这个在革命年代竭力挣脱封建枷锁的知识女性，最终却成为新的权力结构的共谋者。司猗纹并不是单纯的“恶之花”，她被扭曲的过程实际上是女性自我的挣扎，是本真的自我和社会化的自我之间的徘徊与突破，也是现代女性和社会传统的较量。司猗纹企图以真正的女性身份在社会中生存，她的女性意识也在不断的觉醒，她的命运实际上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阶段息息相关，她的人生积极投身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场景，并在其中浮沉。这不仅是从女性的立场上去看待女性，也是将女性置身于社会之中去审视、质疑与拷问，从社会角度拷问女性、拷问社会。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女性的就业结构，增加了女性向上流动的机会，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社会地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铁凝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无雨之城》诞生，这篇小说塑造的葛佩云已不再是一位朴实无华的普通农村妇女，她在特殊年代从一个家境贫寒的女子随着丈夫进城步步高升当到市长夫人，从村妇到官太太的身份转换带来的孤独压抑，恰是市场经济初期城市化过程中进城民众身份焦虑的症候性体现。同一时期诞生的《青草垛》也是如此，铁凝用女性关怀将“三垛”（《青草垛》《麦秸垛》《棉花垛》）统一起来，深刻揭示了物质贫困中的女性依然具有鲜活的自我意识，以

及背后承担的沉重历史压力。疯癫的十三苓让我们看到铁凝残酷地描绘了在物欲世界中不同于“香雪”的女性角色，她们不再是淳朴天真，而是在社会现实中被打磨、被贱卖、被扭曲，乃至于身体的感受也成为被扭曲的对象。这既是乡土中国遭遇现代性冲击的创伤隐喻，也是资本逻辑下女性商品化的残酷注脚。

新世纪以降，铁凝的性别叙事呈现出超越二元对立的史学视野，着重关注大历史背景下的小地方和小人物，以及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动荡。《永远有多远》将一个女子和一座城市的双重命运捆绑在一起，白大省的生存困境揭示出后现代语境下传统伦理的瓦解与重构——当“仁义”成为消费时代的负资产，女性在价值真空中的精神漂泊恰是世纪之交集体焦虑的缩影。“永远有多远”也是对时代价值与个人命运的双重叹问，成为铁凝对读者和社会转型的双重拷问。《大浴女》通过尹氏姐妹的命运轨迹将个体的精神困境与集体性的现代性焦虑编织成复调叙事，《笨花》则以日常生活的巧思与宏观历史的叙事结合，突破以情感叙事和小故事叙事为主的传统女性叙事，以小故事和日常生活为切入点，通过取灯、小袄子等女性角色的命运沉浮，将个体生命嵌入晚清至抗战的宏观史册，在民族存亡的宏大叙事中重绘女性的主体性。

（二）身体的女性到社会的女性

中国现当代女性形象的形塑过程，不能用单向度的现代化理论进行解释。市场经济催生的工具理性、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价值博弈、后现代身份政治的觉醒等多重力量，共同编织成性别秩序重构的复杂图谱。铁凝创作生涯中的女性角色谱系，展示了不同时期社会女性形象，恰如一组棱镜阵列既折射出各时期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及社会现实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是对于同时代女性特征的超越和拓展，隐含着铁凝个人的思考和反思。

铁凝笔下将女性身体作为人性觉醒的重要契机，她正视女性在小说情节、真实社会、具体历史之中的位置，重新反思女性最本质的生活状态，批评性地诠释女性处境，从而理解女性、塑造女性、重构女性的意义。从《灶火的故事》中劳动女性的身体叙事到《玫瑰门》里司猗纹的躯体异化，铁凝将女性身体转化为权力运作的微观场域进行解构。这种创作特质与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中进行辩证考察的情境化知识¹形成跨时空对话。《哦，香雪》中登上火车求索铅笔盒的场景描绘，正是这种创作理念的文学转译——少女对现代性的渴望既非简单的性别解放宣言，亦非被动的文化驯化，而是在城乡碰撞的特定时空中，以身体位移与精神越界共同书写的生活寓言。

铁凝的性别叙事是独特的。其笔下的女性始终保持着双重自觉：既是福

¹ 参见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陈静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7-427页。

柯式规训目光的承受者，又是巴赫金式对话主体的建构者；既背负着历史沉积的性别枷锁，又迸发着解构秩序的生命能量；既是社会规训的具身载体，亦是突破文化桎梏的能动主体。这种叙事策略在《大浴女》中得到充分体现，尹小跳的自我救赎，与尹小帆在消费主义中的精神陷落构成镜像对照，暴露出性别解放的悖论。铁凝对女性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不仅有质疑也有叹息，不仅有欣赏也有遗恨。女性在不仅仅是能指的对象，也是对其所指的规范的指认，铁凝在作品中很好地处理了作为身体的女性和作为社会性别的女性的这对关系，将女性和男性的处境放在社会处境上去思考，而并非将其作为天然的情感存在。

（三）从情感存在到社会存在

神圣化的爱情是传统小说塑造的理想和标杆，充满浪漫化的表达是遮掩现实掩耳盗铃的笔法，女性由此成为创作情感表达的附庸和工具。铁凝的创作打破了这一常规和既定的社会标签，将神圣化的情感祛魅，将人性完整地呈现在她的描述中，母亲不必成为“母亲”，妻子也不必成为“妻子”，不再是承载情感想象的容器，而是撕碎道德假面、直面生存本相的主体。

在男权社会之中对于女性的压迫是方方面面的，无论是对于自由爱情的约束，还是对于其行为的“疯魔化”。《玫瑰门》中的司猗纹，从深闺熟读《女诫》的世家小姐，到圣心女中接受启蒙思想的新女性，最终异化为疯癫的家族统治者，她追求的自由和女性觉醒与当下的社会规则背道而驰，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和惩罚》（2012）中所说，权力是“毫不掩饰的又是绝对‘审慎’的”，是“无所不在无时不警醒着”，也是“自上而下的”和“内在”的，这种权力对身体的控制“玩弄了一整套空间、线条、格网、波段、程度”（200），权力控制渗透在每个人日常生活之中，整个现代社会将身体政治化。被当成疯子的司猗纹精神和身体分离，觉醒的女性意识在理性的社会文化规范中被摧残，因而她强奸了公公作为自己反抗的宣言。其强奸公公的惊世之举，绝非简单的道德崩坏，而是被规训身体对权力机器的绝望反噬。

在司猗纹身上我们看到了铁凝对于女性的拷问，并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本身，而是通过细致地描述女性个体生命的诉求和欲望与整个社会利益和文化规范的冲突，完整地呈现女性在其中的挣扎和生存抗争，哪怕抗争活动是“恶”的。铁凝将女性的社会存在凝注于其笔下，女性不仅仅作为情感表达和情感呈现的客体，而是其主动呈现的主体，女性不再成为神圣化情感建构的工具，而是主动建构了女性自身的情感和存在。

（四）从单向视角到“第三性”叙事

铁凝在《玫瑰门》卷首自白：“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眼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状况”（1）。铁凝的“第三

性”视角不仅仅是内部视角或者外部视角，而是以客体见主体，以主观性验客观性的途径，因而她的女性塑造不仅仅带着时代和社会特征，也能够在文学的内部意义上进行时代的丰富和超越。

倘若处于男性叙事的逻辑中，铁凝对于女性身体的叙事就要落入妇女话语权丧失和空白的境地；如果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女性叙事将会错失对于女性复杂性的深耕。铁凝所塑造的女性角色并未带有强烈的价值预判又或者是道德审判，而是重新思考她们生活行为中曾经被解放政治而忽视的人类情感等非理性化因素。第三性视角是冷峻的，但也是温柔的，既拒绝男性中心主义的宏大叙事，也不陷于性别对抗的偏狭立场。铁凝毫不留情地戳破了社会给女性建构的温顺的图景和幻想，又将同情投射在这些复杂的女性身上。《笨花》中的两面派小袄子，当革命者利用她的身体资源和声名狼藉的名声来获取情报，其轻佻的行为得到了默许，但当革命需要树立道德典范时，其身体又沦为被审判的污名符号，呈现出革命伦理与人道主义的深刻裂隙。铁凝面对事物的复杂性、多面性，不是简单的歌颂革命道德也并不是简单的维护传统伦理，而是将道德伦理和真实人性之间的矛盾完整的呈现出来。

当社会观念内化成为女性自己的生存原则，此时真正奴役女性和压抑女性往往是女性自身，外部传统文化和女性内部双重枷锁导致了女性根本性的悲剧命运。《大浴女》中我们在感知铁凝一贯的女性意识关怀的同时，也看到了铁凝对于彼时社会中人性忏悔的描绘，对于人性超脱的反复纠缠和超越。尹小荃的死亡表面上是尹小跳和尹小帆的旁观，但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共谋，是社会对于尹小荃身份的漠视。从俗世中可以获得解释，然而并不一定能在精神上获得解脱。铁凝通过塑造了同一种经历而不同结局的一对姐妹尹小跳、尹小帆，从而表达了自己的人性关怀，展现了历史褶皱中真实颤动的心跳。

铁凝的“第三性”视角是其性别叙事的核心方法论，既是对传统性别二元论的突破，也是对女性写作范式的革新。这一概念并非生理或社会性别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超越性别对立的认知范式，旨在通过“去性别化”的观察，揭示性别问题背后更深层的社会权力结构与人性困境。

二、社会变迁和乡土写作

（一）基于广阔视野：真淳的乡土书写

如何认识和叙述乡土中国的“乡土性”，是乡土文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乡土中国庞大又驳杂，关于“乡土性”，费孝通的解释是乡下人离不开泥土、“粘着在土地上”的不流动性和熟人社会（费孝通 7）。乡土写作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担当；既要关注到伦理、道德等织就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细节，又要诠释文化、乡土社会之中的传统和发展。铁凝用她一贯的日常生活叙事将种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和自我、家庭、村落、民族联系起来，将个人的命运和几代

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推移到更广大的空间和更长远的时间之中形成历史积累和历史展望。

一是将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描绘紧密结合。宏大的历史发展并不是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而是根植土地的力量。《笨花》将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变迁映照到笨花村的几十年变迁，从英雄叙述过渡到笨花村村民的描绘。笨花村正如中国山河深处无数普通而又平凡的村落一样坐落在这块版图上，而延绵不绝的笨花也正几千年如一日的灼灼昂扬在黄土地上，这正是历史中乡土的不朽、人类的不朽。铁凝在“《笨花》与我”中写到自己的情感“在以向喜为代表的这个人物群体身上。虽然他们最终可能是那乱世中的尘土，历史风云中的尘土，但却是珍贵的尘土，是这个民族的底色”（转引自 贺绍俊 8）。她关注的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这群中国人的生活，他们不败的生活之意趣，人情之大类，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闭塞环境里开阔的智慧和教养，一些积极的美德，以及在看似松散、平凡的劳作和过日子当中，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的种种艰难选择，这群人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转引自 贺绍俊 8）。笨花村的村民在救亡革命的历史中达成了彼此的理解和统一。寡妇大花瓣儿钻窝棚维持生计，用身体换取物资，但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仍然保持清醒和警惕，劝说女儿和汉奸保持距离；平时吊儿郎当做尽风流韵事的西贝二片，在面对被敌军包围的笨花村时，依旧为身后的家乡和村民们挺身而出。这正是处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所需要的“珍贵尘土”。铁凝在这个时代重新回到乡村叙事之中，不仅仅是她所说的表达的是平凡人的生活，也不仅仅是关注世俗的烟火，在乡村叙事之中更能重新返回思考当下的现实社会问题。传统乡村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现代化必经的历史过程。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此之快，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建构起自我认同则成为当务之急，而回到乡土之中正是寻根的需要。

二是用日常生活的细微串联起对农村生活的热忱的向往。在文学作品中铁凝将对于乡村生活的热爱和感触都描绘在田园牧歌之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值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霾、迈入农村改革大潮，华北平原的宽厚和村民的善良使得铁凝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情感态度融入到她对乡土的写作之中。《村路带我回家》中，知青乔叶叶第一次扎根农村是出自响应政策的需要，而当面临着返程和留乡的第二次选择时，她选择了村路带我回家，这一次则是出自本心的选择，超越了政治意义，主动投入乡村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此外，铁凝的笔下透过细节生动的投芝麻、逛庙会等生活习俗描述还原了乡村生活的真实场景，用乡村承载着她的文学理想和社会责任。她巧妙地用日常生活，将村民习俗连接社会和个体，从而将宏大社会结构和个体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打破了等级分明的城乡层级结构。《会飞的镰刀》中趁着大家睡着将学生们的镰刀偷偷拿去磨刀的村民小强和福儿，展现了铁凝心中

乡土世界的人情之美和人性之美，描绘了乡村的接纳和包容。随着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生产力获得解放，在《一片洁白》中乡村青年凭借着在小作坊打工的经验筹建了手套织工厂，响应了当时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号召，也得以见证村民的勃勃生机和活力。

三是把现代作为关照乡土的参照物。在铁凝笔下，乡村和城市、传统与现代始终处于对比和互动的关系中。城市无论是显现的还是隐形的，始终作为现代文明的参照物存在。《哦，香雪》里每天停留一分钟的火车，就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它不仅打乱了台儿沟人日出而作的生活节奏，更让打扮自己以迎接火车到来的少女们通过发卡、文具这些城市物件，第一次触摸到山外的世界。现代以轰轰响的火车进入到乡村之中，也带来了台儿沟的人心浮动，原地等待的少女们既在模仿城市交易规则，又坚持着以物换物的乡村公平原则。香雪为获得铅笔盒短暂离开村庄，最终却选择徒步回家，这个看似矛盾的行为恰恰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年真实的处境：一方面，火车带来的新鲜事物让农村青年渴望改变；另一方面，乡土的情感牵绊又让他们难以彻底割舍传统。铁凝通过这个细节告诉世人，现代化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新旧交织的过程。就像香雪抱着铅笔盒走夜路时，既带着对现代知识的向往，也揣着对家乡的眷恋；既是对于乡土传统的反抗，也是对于新文化的再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处于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城市不断向农村扩张，大批农民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将农村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中。返城工作的铁凝开始用理性的眼光来回打量城乡两个范畴里的特殊和平俗，全面、历史地审视乡村社会的道德伦理、文化心理。铁凝将目光放到农民工上，一方面，她点破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尴尬地位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的迷失和沉沦，另一方面也点出了这群人艰难求生、苦中作乐，展现出能动性、主体性的亮色。《春风夜》中的俞小荷夫妇就是这样一对踏实肯干、怀揣梦想，在外艰难谋生的农民工夫妻，丈夫跑长途，妻子在京城当保姆。铁凝没有刻意渲染苦难，而是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他们最普通的日常。这些细节真实展现了打工者最朴素的愿望——靠自己的双手让父母看病不难、让孩子读书不愁。苦难沉重的“三垛”系列与饱含真淳希冀的《孕妇与牛》都嵌合了她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乡村的思考，不再是单一的颂歌，而是将直视乡村的艰难和挣扎，以日常生活的描绘和诗意化的语言生动地展现了乡村在城乡变迁中最真实的状态。

（二）超越城乡二元：乡村主体性叙事

在现代作家看来，乡土主要指向两个意义层面：一是附属于整个系统性的启蒙工程，对乡土加以再现的目的在于鲁迅所说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在价值判断上对“乡土性”的一种否定；二是以诗化形式实现作家浪漫主义、个人主义的自我确证诉求，乡愁便是对逐渐消失了的“乡

“土性”及其风物的一种回望和怀恋。¹不同于前两种乡土叙事，在铁凝这里，乡土既不是即将被抛去的空间，也不是借助浪漫主义抵抗现代化弊端的工具，铁凝对于乡土的塑造正是建立在对于乡土主体性的认识之上。

铁凝拥有知青生活经验和城市生活体验，她的成长时代和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同步，其作品一方面展现了乡村世界的人性真善美，另一方面也镌刻了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困境和命运浮沉。在凝固的乡土时空里，“香雪们”的生命力宛若穿透雾霭的汽笛，正如火车带来了乘客，现代生活在物质上成为可以触摸的具体。铁凝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平视的眼光、客观的视角将乡村、乡土重新阐释，赋予了乡土在现代化叙事中的新意义，既描绘乡村淳朴、宁静，也强调了现代化生活的入侵给乡村带来的暴力，但她没有陷入城乡二元对立的陷阱，把城市作为乡土的对立面。对于乡村的向往夹杂在她冷静的叙事之中，她理性地审视乡村又谨慎地展现乡村，在描绘乡村淳朴、真挚的风貌和逐渐觉醒主体性的村民的同时，她也揭露了乡村的封闭和保守，将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的刻薄、自私等也展露无遗。但她并非简单地将乡村当成城市化、现代化的纯粹牺牲品，而是从乡村主体性的角度出发看待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种种变迁。

“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它却始终承载着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还有同情心、良知、希冀以及警觉的批判精神”（铁凝，“文学·梦想·社会责任”21）。乡村是中国社会的根基，有其主体性的呈现，并且在乡土上农民的命运和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铁凝小说中对于农民人生、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展现，实际上也是国家命运、社会历史的切片。她通过对农民生活和乡土社会的鲜活呈现，探究社会历史的波澜和变迁，进而反思农民和农村的关系、乡村和城市的关系以及乡土性和现代性的关系。

三、把握人性的细微：小人物承载大时代

（一）社会变迁与个体命运：以日常生活叙述嵌套宏大叙事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社会结构、文明历史的衍生品，也是其组成因素，经验世界也是语言和文字的建构物。身处历史洪流之中的文学家无疑会成为中国现当代社会历史的观照，他们的作品从不同层面勾勒出中国现当代的社会变迁脉络，但铁凝没有把重心仅仅放在宏观的历史潮流上，而是将其目光转向日常生活，将社会结构变革嵌入日常生活的纹理之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变、从传

1 参见王尧：“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中国社会科学》9（2023）：46-60+205。

统伦理到现代价值的裂变，这些宏观历史进程在她的笔下化为具体可感的生命轨迹。

《哦，香雪》中台儿沟的少女们精心打扮，等待火车到来。这看似寻常的等候行为不仅是现代文明对于农村生活的物理入侵，更是一场价值观的无声革命；《寂寞嫦娥》中农村妇女嫦娥嫁给了城市作家佟先生之后两度抽烟从“努力使自己像个城里的贤妻”（227）到“小红点在漆黑的夜里忽明忽暗”（231），揭示了城乡差异的碰撞中农村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价值冲突；《树下》中老派知识份子老于有事相求青云直上的老同学时侃侃而谈文学这一妙趣行为展现了传统文化意识和现代商品经济中理性生存意识的尖锐冲突和现代价值的裂变。

铁凝惯用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来以小见大，用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来消解精英身份和宏大叙事，力图通过人物的生计选择、情感纠葛甚至生存抉择，揭示社会转型的复杂代价，那就是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腾飞、社会的繁荣，更是无数个体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精神阵痛。

铁凝的底层叙事贯注了她深藏客观写实中的丰沛情感，在物欲化的世界中寻求善良纯质的人性，以此来填补传统性和现代性断裂的鸿沟。尽管她的小说没有犀利的判断和一针见血的措辞，但通过对细腻的生活细节的把握、对于情感反复的挖掘，铁凝依然在透过故事本身深入探索社会的复杂性、揭示时代风云的繁复波澜、展示世态风情的古朴淳俗以及人物命运在偶然中的必然。当知青文学浩浩荡荡时，铁凝没有用强烈的意识形态视角和知青主体立场，而是走向了她所观察、记录、探索的农村、人生和历史之中。

（二）社会与人性：互为镜像的辩证书写

人性是社会运行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基本面，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是发现人性、表现人性和丰富人性的重要载体，即再现现实生活，也对人性进行深刻探索。铁凝作品以一种创新的、独特的方式直面人性，揭示人类内心的诸多层面，反映出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其一，在社会规训和反抗中追求永恒的人性价值。人的本性不是空虚的，而是实在的；不是政治的，而是生活的；不是无情的，而是有情的。文学故事总是连接人类体验、意义赋予和现实建构三者的交汇点，铁凝的作品始终聚焦于人性，不仅透彻地理解和精准地把握人性，而且寻求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她笔下的人物从未沦为时代符号的附庸，而是充满血肉的矛盾体。司猗纹以扭曲的方式反抗性别压迫，既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又是自我异化的执行者；安德烈在安分守己的前半生遵循自己的责任，又在下岗风波后与同事迸发出超越传统道德的情爱，而结尾因方向迷失的失败幽会正是传统道德、生存压力与身份认同之间的撕裂，以及个体在宏大历史进程中的无力感；尹小跳对妹妹死亡与出卖朋友的负罪感，既是私人伦理的崩塌，

亦是物质主义时代精神荒原的隐喻，而通过尹小跳的“罪”与“罚”展现了其人性自省和自塑，完成了自我超越，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走向了永恒的价值。铁凝对角色具体的关注不仅是放在具体的事物之中，也是放在对于精神世界的体悟和关怀之上，对于人性的关怀除却具体的感知，也在试图为人性的超越性做出新的诠释。

其二，于人性复杂矛盾中展现宽阔的社会情怀。鲍曼指出：“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正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鲍曼 9）。铁凝的小说传递出的不仅仅是作为作者的体验和视角，也是集体记忆、群体生活和国家观念的倒影，更成为社会建构存续的砖瓦和洞察历史文明变迁的镜子。《笨花》是铁凝真正关注女性和乡土的真实境遇，将性别意识与社会意识、民族意识结合起来，将乡土本体性与民族现代性结合起来的一次成功实践。《笨花》中的角色不再是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或者身体政治叙事的工具化筹码，而是充满生命质感的存在。

文学总是与人联系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5）。人总是处于社会环境中的，文学的质地和底色是要扎根于人心的探究，揭示社会中复杂的人性。铁凝的深刻之处在于，她笔下的人性并非静止的本质，而是社会权力、文化惯性与个体意志博弈的动态产物，她始终坚持用暖意挖掘中复杂人性中的温暖和生命本身的积极价值，给予读者穿越沉沦后上升的力量和勇气，通过笔下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深入挖掘人性的各个层面，寻求对人性更为深刻的理解，激励人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与理想。铁凝努力平衡着自己的三重身份：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和女性身份，努力将内心的文学自由和社会责任融为一体，将社会化的身份角色和个人化的文学理想重叠起来，以此重新唤起文学作品的道义和责任，体现出她建构理想价值、制度愿景、新型和谐社会的希望。

（三）文学作为方法：超越时代的拷问

要理解铁凝的作品，不能脱离近现代的社会语境，不仅要从作品本身理解文学实践，也要将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社会变革的背景浪潮考虑其中。

首先，叙事作为社会结构的认知装置。铁凝小说叙事中反映人物其代表的群体、阶级、历史和文化，文本的背后内嵌社会结构和认知建构。她在塑造女性角色时看到了这些女性角色背后精神钝化的社会及其结构，目光始终从对于女性本身的描写投射到社会文化的堕化，将人物及其精神置身于社会文化结构之中，同现代文明、社会文化相连，这种笔触是残酷的又是温柔的。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批判的吃人的社会，铁凝在小黄米角色的塑造者中也将矛头投向了挑唆默许堕落的社会。这种叙事策略印证了刘子曦提出的“叙事社会学”命题，通过社会互动和自我表达，文学叙事了重构日常生活

秩序和自我身份认同（1）。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现代文明以商品化、市场化的物质形式和精神追求侵入到现实生活和文化表达之中，成为嬗变的中国现代文化思潮之一。铁凝的文学叙事真实地反映了这一进程，既与社会现代化一起追求相同的诉求，但又因其独立性超越了现代性表达的极端和后现代叙事的破碎。

其次，超越启蒙叙事的生命追问。文学不是一个私密性的活动，而是在公共领域的探讨，现代社会的光影会留存在文学领域，审美志趣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时代精神的问题。铁凝拒绝将文学降格为社会问题的传声筒，而是以《永远有多远》中白大省的自我反问颠覆以往为打破男性话语霸权的女性书写的自恋型膨胀和自我放逐，以叙述者对北京胡同生活的执念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活意义困境；以《笨花》中“珍贵尘土”的隐喻，重构历史书写的伦理向度，以第三性视角摆脱传统的叙事立场。正如铁凝自己所说的文学“的根本精神是让人们的心灵能够互通”，创作者需要“保持对人生和世界的惊异之情，和对人类命脉永不疲倦的摸索”（“文学是灯” 43）。铁凝的作品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启蒙主义的理性审判，而是通过第三性视角的文学叙事实现精神和解，捍卫人类精神的高贵。

第三，在互动中关注生活政治。社会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展开。铁凝所塑造的角色也正是如此，处在社会秩序之中的人物角色不断在结构和个体之中拉扯博弈，在互动中不间断地行动，在行动中发展自己的理性，实践自己的动机，维持自己的生存秩序。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认为“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决定的政治”（71-72）。在铁凝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春风夜》里农民工俞小荷夫妇其身体实践既是被规训的客体，亦成为重构生存意义的能动载体。传统和现代彼此冲突又相互依存，构成了铁凝笔下故事的矛盾和张力，不同于解放政治的霸权话语，角色们不再等待生活机遇的到来，而是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解放，正如香雪们“当初她们跳上火车，正体现了那压抑不住的活力。对新生活的希望也许就埋藏在这样可笑的活力里”（铁凝，“文学·梦想·社会责任” 20）。这种活力正是铁凝笔下展现的自我解放，是文明发展的生机，是人类生命的生机。

总之，铁凝创作历程经历了从田园牧歌到危机书写再到文化重构的转型，但她的目光始终聚焦于人的本身，聚焦于生命建构的意义，聚焦于旺盛的人生真实。她的这种书写实践始终嵌套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语境中，通过《笨花》中向氏家族三代人的生存史补全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乡土经验，借《大浴女》中尹小跳的忏悔录解剖市场化时代的精神症候，将个体的生命经验转化为诊断社会病理的棱镜，揭示文学现代性与社会结构变迁既共生又对抗的张力。她的作品成为重唤民族精神的楔子，以拷问人性来叩问人类精神，以反省自身来追问生命，从而为社会和时代探索出路。

结语：叩问社会变迁与人性本质的永恒

铁凝基于城乡嬗变、代际冲突、文化碰撞的多元叙事，笔下有热烈的情欲描写，也有冷静的历史叙述；有女性角色的深入探讨，也有社会环境的全面呈现；有个人成长，有时代变迁；有爱与恨的纠葛，也有罪与罚的探问，通过对角色生命历程的细腻描绘，不仅忠实地记录了时代变迁，深描了复杂的人性，更是对于社会与人的关系的本质探寻。她用“第三性视角”突破了以往传统性别与城乡二元对立的固化叙事逻辑，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个体在其中的复杂处境，展现了社会结构变迁中各种社会关系重新调试的矛盾和适应过程。

文学始终在为失落者招魂、为前行者掌灯守夜。从宏观层面看，铁凝拒绝以空洞的进步或倒退标签简化社会历史变迁，而是通过人物的生计选择、情感纠葛甚至生死抉择，清晰映照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结构裂变与市场经济重组，揭示社会转型的复杂代价，揭示社会变迁的终极意义。铁凝的创作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困境提供了诊断切片，更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贡献了本土经验。从微观视角看，铁凝的作品以锐利的笔触穿透表象，直抵人性最深层的异化、矛盾与渴望，从《大浴女》的灵魂救赎到《永远有多远》的生存悖论，她始终在探索人性突围的可能路径，蕴含着对于人性本质的哲学性追问。如何在现代化狂飙中避免人性的物化？如何在工具理性至上时代重寻精神的家园？因此，当我们在全球化与后现代的复杂社会语境中重新审视铁凝的作品，其价值愈发显现。

Works Cited

-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Bauman, Zygmunt.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translated by Shao Yings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Fei Xiaotong.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陈静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Haraway, Donna.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translated by Chen Jing. Kaifeng: Henan UP, 2016.]
- 贺绍俊：“《笨花》叙述的革命性意义——重读《笨花》及其评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1 (2008) : 5-9.

[He Shaojun. "The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the Narrative in *Clumsy Flower*: Rereading *Clumsy Flower* and Its Reviews." *Journal of PLA Academy of Arts* 1 (2008): 5-9.]

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社会学研究》

2 (2018) : 164-188+245。

[Liu Zixi. "Story and Storytelling: A Path Towards Narrative Sociology and the Chinese Stories." *Sociological Studies* 2 (2018): 164-188+24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铁凝：“文学是灯——东西文学经典与我的文学经历”，《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 (2009) : 43-45。

[Tie Ning. "Literature as a Light: Eastern and Western Literary Classics and My Literary Experience."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on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2 (2009): 43-45.]

——：“文学·梦想·社会责任——铁凝自述”，《小说评论》1 (2004) : 17-21。

[—. "Literature·Dream·Social Responsibility: Tie Ning in Her Own Words." *Fiction Review* 1 (2004): 17-21.]

——：“寂寞嫦娥”，《安德烈的晚上》。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21-235页。

[—. "Lonely Chang'e." *Andrei's Evening*.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221-235.]

王蒙：《蝴蝶为什么美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Wang Meng. *Why Are Butterflies Beautiful*. Shanghai: Fudan UP, 2007.]

王尧：“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中国社会科学》9 (2023) : 46-60+205。

[Wang Yao. "The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of Rural China: From Native-Soil Literature to 'New Native-Soil Literatur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9 (2023): 46-60+205.]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钱永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Qian Yongxiang.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04.]